

C2 财富情报·财富人生 | CAIFURENSHENG

香港大亨换代潮:豪门家族交接进行时

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经济金融研究所所长范博宏对《第一财经日报》分析,港澳地区大亨们开始陆续面对家族交棒问题,特别是过去两三年来,包括新鸿基、澳门赌王何鸿燊和周大福郑裕彤家族都在进行交接,但其中问题不断,交接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李嘉诚是否能顺利交接仍需观察。

日前,“超人”李嘉诚公布资产分配方案之后,香港现四大家族除恒地李兆基家族外,均已经完成或公布了家族传承计划。

而近年来不断上演的豪门“争产”风暴,使得李嘉诚所称两个儿子“都开心,大家都不会麻烦”的财产分配方案显得有些“别样”。

现年83岁的李兆基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便称:“儿女多很麻烦,香港富豪中有3个儿子以上的多数不行,两个就好很多。”“四叔”表示,他的两个儿子目前同为集团副主席,但两人负责不同业务,分工清晰,其中长子李家杰主管集团内地业务,幼子李家诚则主管香港业务。

李嘉诚公布资产分配当日,长实股价一度回软但仍以上升收报。当被问及股价由高位回落是否反映市场对“交接”安排不看好时,李嘉诚笑称,他每天都看着李泽钜,对其认识多于外界,若市场不看好则是错了。

李嘉诚分家产

“本来这件事不准备讲,既然问到了我就讲,因为这迟早都不是秘密。”今年84岁仍精神矍铄的“超人”李嘉诚,近日令人意外地公开谈起了分家产的事。

虽然李嘉诚强调“我至今仍没想过退休”、“现在还未将资产分配予儿子,只是将来会给予他们”,但是外界仍将这标志性的举动解读为:或许意味着大亨们的时代正在终结,“二



代”们的接班过程将提速进行。

李嘉诚与已去世多年的夫人庄月明共育二子,即现年48岁的李泽钜和46岁的李泽楷,昵称分别为“小超人”和“小小超”。

对于资产分配安排,李嘉诚承认思考安排已久。

而实际上,这样的安排可能与初期有所调整。和黄年报显示,李嘉诚原本设有最少4只信托基金,持有其在和黄的部分股权,由李泽钜及其家人和李泽楷作为受益人。信托基金的最终控制人是 Unity Holdco (Li Ka 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 李嘉诚联合控股有限公司),由李嘉诚、李泽钜和李泽楷各持有三分之一的股本。

将家族财产注入信托基金,让家族成员成为受益共同体的做法在香港富豪家族中一直相当普遍。范博宏向记者表示,在研究100多个这样的信托后,发现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有很大问题——家族成员被信托绑在了

一起。“若是不和谐的家庭,加上家族信托,等于企业价值的毁灭。”他说。

实际上,近年来处在“争产”风暴眼中的新鸿基郭氏家族、霍英东家族,均是通过信托方式锁定家族成员。由于永久信托难以解散,令家族成员无法解套。以郭氏三兄弟为例,大哥郭炳湘无法与其余两兄弟达成赔偿,并被剔除信托基金受益人身份,从而将争产扩大到廉政公署介入的官商勾结风暴。

范博宏称,李嘉诚只有一部分资产是通过信托管理,主要控股股权仍在他个人手中,从而可以自由转移股权。

10年前已现端倪

范博宏分析,李嘉诚的分产方向其实10年前便现出端倪。“长子留公司,小儿子在外面发展,这样的安排并不意外。”

“长和系的资产将由 Victor(李泽钜)管理,将来 Victor 会持有多于

40%的长江股份、百分之三十五点多的 Husky(赫斯基能源)股份。”系蓝色领带、着黑色西装白衬衣的李嘉诚在5月25日的股东大会之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如是说。

“Richard(李泽楷)有自己很喜欢的事业,我会全力帮助他,现在他正在接洽收购几间相当有规模的公司,所涉及的资产会比他现有资产(多)以倍数计。”李嘉诚认为,李泽楷将会有很好的事业,接洽业务与长和系没有冲突,两兄弟在事业和财产上都没有冲突。

这样的安排意味着,长子李泽钜将成为长江集团万亿王国的掌舵人,次子李泽楷则将在父亲资金支持下,建造属于自己的王国。

1940年来到香港的李嘉诚白手起家成为香港首富,创下庞大的长江实业集团,长和系包括长实、和黄、电能实业和长江基建,此外长江集团还拥有和电香港、长江生命科技和 TOM 集团,业务遍及房地产与酒店、电讯、基建、港口、零售、能源和科技等。截至今年5月底,总市值近9000亿港元。

根据2012年香港富豪排行榜,李嘉诚身家为220亿美元(约1708亿港元),李泽钜并未上榜,拥有电讯盈科的次子李泽楷则以12亿美元(约93亿港元)身家排名33。

以长和系市值约4956亿港元、加拿大上市赫斯基能源1722亿港元市值计算,李泽钜身家可达2671亿港元,华人新首富即将诞生。

曾就读斯坦福电脑工程系的李泽楷则出去闯另一片天地。2000年他举债930亿港元收购香港电讯的“蛇吞象”举动令市场诧异,随后公司市值大缩水、私有化未遂并惹来“种票”疑云。

李泽楷现有电讯盈科、香港电讯和盈大地产三家上市公司,市值约619亿港元。李泽楷与前女友梁洛施育有三子。

李泽楷一直热衷于媒体和电讯行业,曾创办 Star TV 并转卖给新闻集团获利。李泽楷现是信报大股东,并积极开拓广播电视业务。李嘉诚称,将以资金支持他收购一些传统和长远的新业务。“若收购不成事,也会预备该笔款项让他发展新事

业。”

李嘉诚自称还有“第三个儿子”,就是1980年创立、已注入他三分之一财产的李嘉诚慈善基金会。退休后李嘉诚将把更多时间用在基金会上。此前4.5亿美元投资 Facebook 的股票和过去两年增持的长和系股份,都归入李嘉诚慈善基金会,以后该基金会由两兄弟共同管理,李泽钜担任主席。

为长子树威信

李泽钜20岁便从斯坦福大学毕业获得土木工程学士学位和结构工程硕士学位,随后进入长江集团工作27年,现担任长江集团副主席、长实董事总经理、和黄副主席、长江基建和长江生命科技主席、电能实业执行董事和赫斯基能源联席主席等重要职位。

李泽钜为人低调谨慎,已婚并育有三女一子,每逢记者会他总是坐于父亲右手边,鲜有主动回答问题,除非“超人”令其补充发言。而坐在李嘉诚左手边的,是被称为“大管家”的霍建宁。

现年60岁的霍建宁是香港“打工皇帝”,去年他的薪酬加花红共1.7亿港元,李泽钜薪酬加花红则不足霍建宁六成。除霍建宁外,“开山”元老级别的叔父辈们还有甘庆宁、叶德铨、赵国雄等人。对李泽钜来说,他们可能既是重要帮手也可能是无形压力。

有金融界人士向记者透露,在一次大型基金和公司董事的会议中,李泽钜的某提议被某董事驳回并让他回去问问父亲,令现场气氛颇为尴尬。

在今年3月的年度业绩记者会上,当有记者问及长实留住“老臣子”的秘诀是不是高薪时,向来拘谨的李泽钜居然开起了玩笑:“你惨了,敢说他们人工高。”

范博宏认为,李嘉诚选择在公开场合正式宣布资产分配方案:一是其家大业大,企业地位显赫;二是他年事已高,对投资者来说有不确定性;三是公开声明定调后,让不同关系人心里有数,包括他的职业团队。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文/郭兴艳)



随着北京海淀法院的判决尘埃落定,外地女子王某的“长安梦”碎了一地:为了落户北京,王某与精神病人小张登记结婚。后被张某监护人发

现,起诉到法院。日前,法院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为由判决二人婚姻无效。

“落户式婚姻”的算计与悲怆

为了成为真正的“北京人”,不惜寻求精神病人的“帮助”,通过“婚姻捷径”获得一个京城户口,该名外地女子这种攻于算计的做法令人生厌。然而,刨去道德层面的价值判断,当“黄粱美梦”遭遇“梦醒时分”,我们还是多少能够从中读出一丝个体的悲怆与哀鸣。

必须承认,尽管“逃离北上广”的说法日新高涨,但相比零星的离乡者,更多的人则像飞蛾扑火般涌向这几座代表着繁荣与进步,交织着理想与欲望的大都会。然而,森严的户籍壁垒却使他们不得不舔舐“久在异乡

为异客”的苦涩。

于是乎,找“屌丝”“土著”结婚便成了许多外来者,特别是弱势女性的重要法门。当“落户式婚姻”成为一种现象,与其说是“人性之恶”使然,毋宁说是拜社会现实所赐。

一方面,巨大的区域差异、不均的资源分配使得北上广拥有了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城市魅力。别的不说,单就教育一项而言,根据北大法学院的一项研究课题得出的结论,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换句话说,落户北上广是每位“理性经济人”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坚硬的户籍政策却在各种堂皇理由的装扮下陡增着迁移者的“机会成本”。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接纳了外来者的劳动与税收,凭什么不让他们分享自己的资源与福利?要是没有户籍政策的阻碍,谁会愿意嫁给精神病人?

由此而言,王某不过是现实“子宫”中孕育出的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悲剧人物。如果区域间的发展失衡得不到改变,户籍壁垒不能够彻底破除,那么“落户式婚姻”便不可能彻底消失。

(摘自《广州日报》文/王垚烽)

博士谎称省领导秘书 诈骗企业家20余万

拥有博士学位的他曾是一家杂志社社长,然而他却利用采访报道的职务便利,假称现任省领导秘书,向企业家实施诈骗。日前,林某强涉诈骗罪一案在越秀区法院一审。

起诉书称,林某强出生于1968年,广东省茂名高州人,拥有博士学位。资料显示,林某强多年前注册成立了广东宝葫芦影业有限公司,并任董事长。2008年“宝葫芦”开始承办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主管主办的《源流》杂志社,林某强就任杂志社社长,他的加v微博的认证信息是“广东省源流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党支部书记”,其粉丝数一度逾200万,但被媒体质疑是购买僵尸粉。

被害人刘女士是广州某企业的董事长,在一次博览会上认识了身为杂志社社长林某强,由于刘女士的企业在业内颇有名气,林某强便推荐其在杂志做封面人物。

交往的过程中,林某强声称自己是某省领导的秘书,并向刘女士出示了自己与现任省领导及多名老干部的合照,取得刘女士的信任,然后声称自己可以帮助刘女士的公司申报国家级星火计划和国防教育培训基地。

在林某强的引导下,刘女士先后7次通过转账及现金给付,将243000元交给林某强,但申报一事全无下文。她开始向林某强追讨欠款,林某强从杂志社开出两张共计10万元的空头支票企图敷衍过去,在银行没有取到钱,经过磋商刘女士只讨回了54000元。

庭审后刘女士告诉记者,2010年年底在一个活动偶遇该省领导,恰好当时有人打电话告诉她林某强的身份有诈,她马上在现场向省领导的秘书求证林某强的身份,才知道林某强是蓄意诈骗,之后便报警。

林某强2011年9月2日被省纪委双规,2011年12月14日被检察院批捕,今年年初已被开除党籍。

公诉机关认为,林某强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提出3年至10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庭外

另一女子声称被骗逾百万

坐在法庭里旁听的除了本案受害者刘女士外,还有自称被林某强骗取过百万元的蔡女士和被骗10多万元的苏女士。

“当日就是我打电话给刘女士揭穿林某强是个骗子。”蔡女士是梅州市一名企业家,她拿出借条、合同和“宝葫芦”的资料册表示,此前林某强以自己 and 现任省领导在不同场合的多张合照为幌子,假称自己是领导秘书,在2009年以联合拍摄革命老区电视剧为名向蔡女士借款113.5万,至今尚未归还。

庭审结束后林某强被押离法庭时,情绪激动的蔡女士和苏女士几欲出手打林某强。

(摘自《南方都市报》文/陈万如)

中国收入差距扩至23倍 分配改革方案8年仍难产

从2004年以来,有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但每次都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已刻不容缓。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8年难产 媒体曝下半年出台

2004年,收入分配改革启动调研,但时至今日方案依旧难产。不过,最近有媒体曝出“收入分配改革总体



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的消息,再次引发公众热议。消息称,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其中,调整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是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

对此消息,新华每日电讯评论指

出,8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人们已经多次听到。正如它无声无息地制订,公众看不到一份征求意见稿,它又无声无息地被退回,不告诉公众一句退回的理由。但这一次应该有些不一样,因为“制订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是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提及的“一定要做,努力做好”的今年五项工作之首。

种种迹象表明,此次“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出台”的消息似乎不再是“只闻楼梯响”,更值得期待。就在温总理表态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工作分解落实。在需要努力完成的7项主要任务之中,“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同样居首。此外,在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中,“抓

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列入规划,明确的责任单位为: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等。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计划,肇始于2004年。其后,曾召开多次征求意见讨论会。之所以仍未能与公众见面,有分析认为,“牵涉到各种利益的博弈”是最大原因。今年,这个方案将要完成制定。

收入差距已扩大到23倍 公众热盼方案尽快出台

经济参考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目前收入分配失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利益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比重逐年上升,而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却是持续

下降;二是居民内部的家庭与家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显著拉大。

收入差距扩大一直刺痛着公众们敏感的神经。据新华网报道,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此前,有银行员工抱怨说,年薪20万生活压力依然很大,慨叹“生活在底层”,这遭到网友炮轰,而行业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更是再次被聚焦。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社会

学家于2006年、2008年和2011年所作的社会问题综合排序表明,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始终被公众列为所关注社会问题的第三位。

可见,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刻不容缓,而公众对于方案的出台更是望眼欲穿。经济参考报的评论指出,公众对于收入分配改革有三大期盼,一期待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二期待缩小贫富差距,限制垄断行业的暴利,尽快实现以家庭为单位征收,降低工资阶层纳税比重。三期待让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公共投入的增长速度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强力压缩“三公消费”节省行政开支,将国有企业每年上缴红利更多用于提高国民福利,并在公共福利分配上体现出更多的倾向性和兜底性。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